

# 非 逻辑 的 变 通

——从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看古代占卜、巫术的互补结合

陈于柱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0)

摘 要: 占卜与巫术本是两种不同思维倾向的神秘文化, 但作为占卜书的敦煌写本宅经却将巫术化的镇宅法“移植”于其中。这种“移植”可以起到占卜本身非逻辑变通的作用, 即“镇宅法”特有的巫术特点, 使中国传统可预知、可改变的命运观, 在占卜与镇厌巫术的互补中得到满足; 由于“镇宅法”中融入有道德因素, 因此当出现占辞与人间事实不符的矛盾时, 占卜借此可获得更广的解释余地。以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为个案, 结合敦煌杂占文书与传统文献, 可看出古代占卜文化“非逻辑变通”特性的存在及其影响。

关键词: 敦煌写本宅经; 镇宅法; 占卜; 巫术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371-1351 (2006) 01-0060-05

据学者研究, 敦煌遗书中现存的占卜类文书大约有 274 件左右。<sup>[1]</sup> (P3) 其中属于宅经的资料, 我们根据业已公布的敦煌汉文写卷, 统计有 20 件。敦煌写本宅经是唐宋敦煌师卜文士为满足当地相宅卜居需要, 对中原传入的各种相宅著述进行删选节略、并与敦煌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占卜书。有关镇宅禳灾的技术与方法, 在诸多宅经写卷中均有记载, 这包括: P.2615a、P.2964、P.3281vb、P.3594、P.4522va、P.4667va、S.4534v。其中, 有的书有标题, 如“凡四邻造作及自家泥垒犯触转为福法”(P.2964)、“用石镇宅法”(P.3594)、“推镇宅法第十”(P.4522va)、“镇宅法第六”(P.4667va)、“石镇法第七”(P.4667va)、“治宅谢厌解法第八”(S.4534v)等; 其余则直序种种厌解之术。为叙述方便, 我们将上述性质相同的内容统称为“镇宅法”。这些内容在宅经中别具一格, 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在整理敦煌写本宅经过程中发现, 尽管“镇宅法”为其构成之一, 但就所占比重来讲, 宅经在整体上更侧重于如何相宅择地, 换句话说, 敦煌写本宅经更多体现的是占卜。厌胜巫术出现在占卜书中的现象绝非宅经所仅有, 敦煌本梦书与其他杂占文书中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如 P.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一卷》专设“厌攘恶梦章第二十三”<sup>[2]</sup> (P23), P.2632《手诀一卷》、P.3288《西秦五州占》等占候书亦附有各种符禳之法。

此类现象的出现, 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古代中国

占卜与巫术关系的思考, 进而探讨和揭示古代占卜“非逻辑变通”的特性。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对此则具有很好的个案意义。需要说明的是, 对古代中国占卜与巫术的互动研究始终未引起学界重视, 更没有人利用敦煌占卜文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本文试图作一个尝试,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 一、敦煌写本宅经对“镇宅法”的“移植”

就“镇宅法”所展示出的各种镇厌法术而言, 在其形态、性质上无疑属于巫术。严格来讲, 巫术与占卜虽然均属神秘文化, 但仍然体现了两类不同的思想原则。陈来先生对此曾有过详细论述:

就自然占卜而言, 自然巫术是诉诸交感法则, 企图通过动作、言语来调动、操纵那种马雷特称之为类似自然科学所谓的自然力量, 而自然占卜则不是实践性、操作性的, 是认知性的, 它只是企图神秘地去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 巫术与占卜的区别, 正如技术与科学的区别一样。至于神灵巫术(萨满)和神灵占卜, 其间也有类似的分别, 神灵巫术是要利用和搬动神灵的超自然力量来实现对某一客体的影响; 而神灵占卜则是企图通过超自然的启示了解人类自身理性与感性所不能了解的事项或领域。<sup>[3]</sup> (P74)

简而言之, 占卜是要获得对欲了解问题的答案或决定, 而巫术则力求以行为影响事物的进程。所

收稿日期: 2005-11-12

作者简介: 陈于柱(1977-), 男, 江苏邳州人,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 硕士。

以，从思维倾向来看，“镇宅法”与宅经是不同的。此外，两者的相异还可从以下两方面得以体现。

其一，P.4522va《推镇宅法第十》载：“凡人家虚耗，钱财失，家口不健，官职不迁，准九宫八宅及五姓宅阴阳等宅同用之，并得吉庆。”其意为镇宅法术对“九宫八宅及五姓宅阴阳等宅”均可以镇厌。通过研究可知，所谓阴阳宅、五姓宅、八宅，是占卜理论分别按照阴阳、五姓和八卦等三种分类原则对居宅所作的划分，以这三种宅名为中心，在唐宋时代分别形成有《五姓宅经》、《阴阳宅经》、《八宅经》等一些列占卜书。<sup>[4-6]</sup> (P44-45, 66-78, 237-259) 但在敦煌写本《五姓宅经》、《阴阳宅经》、《八宅经》文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有关镇宅法的内容；镇宅法主要出现在具有合集性质的P.2615a《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P.4667va《阴阳五姓宅图经一卷》以及混抄性质的P.2964《凡四邻造作及自家泥垒犯触转为福法、土公土符移法等（拟）》、P.3281vb《宅厅梁屋法等（拟）》、P.3594《推五姓墓月法、用石镇宅法等（拟）》、P.4522va《推镇宅法第十》等写卷中。这说明具有系统理论支撑的宅经突出的是其占卜功能，往往并不包括镇宅法。赵贞先生在讨论敦煌占卜书《西秦五州占》时也注意到类似现象：“《西秦占》寓有浓厚的巫术因素，这在正统的星占书《乙巳占》和《唐开元占经》中，都是无法见到的。”<sup>[7]</sup> (P60) 可以说，厌胜巫术在理论逻辑上与占卜书是没有连贯性的，更多呈现相对的独立性和普遍的适用性。

其二，两者各自所反映的命运观也不同。占卜是要对过去或未来作出解释与吉凶判断，那么未来在占卜中就必须是确定的，如果未来不定，则占卜预测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功能，因而占卜基本反映的是命运可预测、并具有确定性的命运观。而包括镇宅法在内的各种巫术，其目的则是要改变既定事态，所以它所反映的命运观则是可改变的。

既然“镇宅法”与敦煌写本宅经在性质、理论、命运观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作为占卜书的宅经还力图将镇宅法“移植”进来？

## 二、非逻辑的变通

问题答案的寻找还需从占卜自身开始。

理查德·诺瑞斯 (Richard Norris) 曾将古代社会占卜的类型分为三种：(1) 直觉式(intuitive)。占者不需要借助任何媒介就能自发地看见或指导现实和未来；(2) 附体式(possession)。神祇通过媒介与人交通，媒介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飞禽、昆虫之类。火占、水占、石占、梦占、语占、恍惚占、鸟占等属于此类；(3) 智慧式(wisdom)。占者解释非人格性的现实。这类占卜仍视宇宙秩序有神性，但更认为宇宙进程由非人格性的法则控制，智慧式占卜包括占星、风水、手相、面相、骨相、中国的《易经》等。<sup>[8]</sup> (P76-77)

其中智慧式占卜即以非人格的法则来对命运进行机械式的预测，这些法则主要为互联思维 (correlative thinking) 下的阴阳、五行、八卦等数学理论。敦煌写本宅经作为提供择宅相地参考的占卜书，毫无疑问，在占卜类型上基本是属于智慧式的。智慧式占卜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事物发生的原理和吉凶判定的依据：

阴阳五行体系的建立无疑使人们详细预知未来成为可能。阴阳五行的理论为人们提供事物发生的原理。我们知道，鬼神观念也起着解释祸福发生的原因的作用，最初的占卜行为就是人与鬼神打交道从而达到趋福避祸的目的的途径之一。然而，早期的占卜不能详细预测未来，因为当时尚未形成预测未来所依赖的理论。仅预测未来一句是否有祸的占卜，也不必解释原理的问题，吉就是吉，凶就是凶，这是根据实现的规定而定的。但是，详细预言未来的占卜如果不提供任何理论依据的话，恐怕无人会信服。<sup>[9]</sup> (P69)

智慧式占卜的优点还在于它可以作无限机械式的预测：

《周易》编成后，人们在使用它进行占断时，逐渐发展了一个固定的、机械的宇宙体系的概念。由于这一宇宙体系具有机械性，其运动就可以预测。也就是说，这一机械性的宇宙观的形成帮助人们提高了预测命运的程度。<sup>[9]</sup> (P73)

但智慧式占卜的缺陷同样也很明显。

占卜预测的机械性必然带来占辞的固定化。史华茨 (Benjamin Schwartz) 认为，中国古代占卜，最初是探知神意，但是，当人们建立起人与自然交感的感念后，神祇的作用就减退了，随之出现的，是征兆含义的固定化和解释征兆含义的固定化。<sup>[9]</sup> (P73) 敦煌写本宅经中的占辞一般比较明确，特别是在福祸征兆上，吉、凶结论基本不存在含糊的现象。占卜终归属于神秘化的事物，显然是经不起理

性检验的，因此吉凶明确和固定的占辞，往往使占卜自身陷于不利的境地，不可避免会出现占辞与人间事实不符或相反的情况。所以，占辞的固定化势必影响占卜自身解释的余地。郑炳林先生也注意到唐五代占卜中这一问题的存在，郑氏指出：“敦煌写本占卜书特别是梦书、相面书中，占断辞都非常明确，毫无隐讳含糊而言，我们知道越是占断辞明确的越容易出现矛盾，如果不解决这种矛盾，占卜活动就无法取信于民众心理”。<sup>[9]</sup>（P1）

智慧式占卜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其机械式预测所带来的未来命运的确定化，大大降低了命运的可改性。诚如陈宁先生所言：

当这种固定的、互联的宇宙观形成后，占卜贞问的对象不再纯粹是鬼神，而是一个更广泛的，包括鬼神在内的宇宙体系。因此，人之祸福由过去鬼神决定的观念发展为有互联的宇宙和鬼神共同决定的观念。这时的占卜仍然可预知命运，但已预测的命运不再如同以往那样总可以改变，因为人可以交通鬼神而不太可能与非人格性的、互联的宇宙讨价还价。这一沟通方面的限制降低了命运的可改性。<sup>[9]</sup>（P87）

古代中国民间信仰特有的实用性格，使命运既可预知、亦可改变的观念在民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特别是当预知当前或未来为凶兆的时候，民众从趋吉的角度出发，一般都希望能够“逢凶化吉”，扭转既定命运，以获得心理的解脱。《旧唐书·方伎传》：

尚献甫，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为道士。则天时召见，起家拜太史令，固辞曰：“臣久从放诞，不能屈事官长。”则天乃改太史局为浑仪监，不隶秘书省，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长安二年，献甫奏曰：“臣本命纳音在金，今荧惑犯五诸侯、太史之位。荧，火也，能克金，是臣将死之征。”则天曰：“朕为卿禳之。”遽转献甫为水衡都尉，谓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也。”<sup>[10]</sup>（卷19）

尚献甫本推算自己“将死”，但武则天却认为通过一定的厌禳术足以改变即定的占卜结论。

宋人洪迈《夷坚志》“十字经”条：

吴人周举，建炎元年自京师归乡里，时中国受兵，所在寇盗如织。举遇星冠羽服人谓曰：“子明日当死于兵刃，能诵十字经，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寿。”举跪以请，云：“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盗，逼逐至林

间，窘惧次，猛忆昨语，亟诵一声。犹未绝口，雷声大震，群盗惊走，遂得脱。<sup>[11]</sup>（第一册 P415）

吴人周举当听说自己“明日当死”，但通过咒诵十字经“不唯免死，亦能解冤延寿”时，马上“跪以请”，命运既可知、亦可改的实用心态在这里同样表露无遗。

但占卜自身特点，决定了它无法兼顾信众这种可知、可改命运观的要求，如不变通，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占卜在民间信仰中的存在价值。

古代中国民众的信仰需求造成了占卜的逻辑“困顿”：一方面，占卜未来必须以未来已定为前提，未来未定则无法占卜预测；但这往往容易造成占辞与事实的矛盾不符。另一方面，如果未来已定，在占得有祸以后，而人们不能改变未来，这样占卜就会失去了趋利避害的基本功用。

敦煌写本宅经（占卜书）对“镇宅法”（巫术）的“移植”则很好地解决了这种困顿。

包括镇宅法术在内的各类巫术，“本质上是相信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人们可以凭借它实现自己的非人力所能实现的愿望。”<sup>[12]</sup>（P296）因此，占卜与巫术相结合，一方面，如果占得有祸，马上可以利用各种厌胜术进行禳禳，以改变即定之“厄运”；另一方面，尽管这种结合从理论上讲是非逻辑的，但由于占卜与巫术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命运观，所以两者的结合，实际就等于将命运可预知、可改变的两种观念融合在一起，以满足古代信众的心理需求。一般民众出于信仰上的实用生存需要，往往并不在意这种占断方式是否逻辑化；而占卜借此则可以增加自身的变通性和提高对民众的吸引力。正因如此，不仅诸种敦煌占卜书将巫术融入于其中，而且在传世史料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占卜、巫术互补使用的记述。《晋书·艺术传》：

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或谓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试就卜，知祸所在？”瑗性质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岂卜筮所移！”会（淳于）智来，应詹谓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灵之思，可为一卦。”智乃为卦，卦成，谓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持荆马鞭者，便就买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十余万，于是致贍，疾者亦愈。<sup>[13]</sup>（卷95）

同传亦载：

严卿，会稽人也。善卜筮。乡人魏序欲暂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



东行，必遭暴害之气，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著船前。”求索止得驳狗，无白者。卿曰：“驳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余小毒，正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然作声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余。<sup>[13]</sup>（卷95）

材料中卜师淳于智与严卿，先是对问卜者命运不济作出解释或为其预测未来，并随之向他们提供了应对困境、转危为安的各种厌解术。这样一来，占卜不仅保存了原本预测解释的功能，而且由于结合上了厌胜巫术，从而使其“消殃转祸”的功用更加完善。

那么，这种非逻辑的变通，对于解决占卜因为占辞固定所带来的结论与事实不符的困顿有何帮助呢？

### 三、非逻辑变通中的“德感”

实际上，古代占卜为摆脱这种困顿已作了相应的调整。郑炳林先生曾根据敦煌本梦书与相书指出，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是解决占辞预兆与现实矛盾的较好方法，所谓行为决定论“就是行为决定征兆结果，这样不但解决占断辞与结果的矛盾，而且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对稳定社会鼓励民众努力向善起到很大作用”，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行为是无法用量化标准衡量的，好行是什么样的程度，谁也无法确定这个标准，因此相对数量标准法来说出现更宽的回旋余地。”<sup>[9]</sup>（P67）

如果我们从命运观的角度来看，“行为决定论”实际反映的是一种“道德定命论”，因为行为的好坏评定最终是要归结到道德层面上的。此种命运观不仅起源早，而且使占卜也较早地由“道德中性”转向具有“德感”，研究表明：

春秋中期以前的卜筮文化和筮问活动，都没有对于德行的要求。而现在，筮问者本身的德行和筮问者将要从事的行为的性质，都成为筮问是否正确预知未来的前提条件。筮问的正确性，要求筮问者具备基本的德性，要求所问之事必须合乎常情常理。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无论筮占的结果如何，事实的发展和结果必败不吉。这样一来，“德”的因素成为卜筮活动自身所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则。<sup>[14]</sup>（P36）

唐宋敦煌占卜的“道德化”不仅体现在敦煌本梦书、相书上，宅经同样也对问卜者的德行有所要

求，如P.2615a《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一卷》中的“卜安宅要诀”规定：“西方高中央下，名曰周地，一名地藏之地，居之富贵，君子吉，小人凶”。其“水渎法”也规定：“流出午地，君子爵禄位，小人凶”。相同的兆辞，但对于具有不同修养的筮问者，其吉凶结果并不一样；至于筮问者是否具备了“君子”的品行，显然不是占卜所要回答的了。

窃以为，具备“德感”的占卜固然可以较好地解决占辞预兆与现实矛盾的“尴尬”，但这只是隐晦地回答了矛盾产生的原因，而对于如何解决矛盾、特别是预兆本来是吉而现实却相反的情况并未给以明确，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占卜趋福避祸的能力，因为它没有给占得凶兆者提供现实的、“廉价”的厌禳之法以改变厄运。

敦煌占卜文书显示，古代占卜、巫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再次作出调适。

P.4522va《推镇宅法第十》在详述镇厌的具体技法后，规定：“埋镇之后，百日内不煞生，不行大（淫），不出恶语，慎之大吉。”其意非常明确，即在厌胜法术完成后，问卜者只有严格遵循上面“不煞生”、“不行淫”、“不出恶语”的三条禁忌，镇宅才会有好的实效；换句话说，如果在镇宅法术实施之后，问卜者命运依然不济，其责任即不在于占卜、也不在于巫术，而是在于问卜者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镇宅法”规定的禁忌。P.2632《手诀一卷》对各种符禳法术亦设有禁忌，如“晋昌辰星（符）愿具之五星，我知之了，各摄恶气，我自修善，转祸为福。咒讫，大将须三七日用良贤，召臣取义”、“敦煌岁星（符）布恩恤下，怜孤敏穷，思下士偈。用此李（礼）禳之，事所有灾乱，便自消失，更不为灾”，要求在举行禳灾仪式后，受法者还必须“自修善”或“布恩恤下、怜孤敏穷”，才能实现“转祸为福”的愿望。

以上诸种禁忌无疑是具有道德意味的，这就使巫术同占卜一样也融进了“德感”。兼具这一特性的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进而能同时兼顾两个方向上的要求：从问卜者角度来讲，“镇宅法”为之提供了镇宅禳灾的技术方法，信众命运可知、可改的实用心理借此可得到满足；从占卜角度来讲，因为“镇宅法”是“移植”在宅经中的，所以占卜在面对预兆与现实矛盾时，“镇宅法”的道德化同样可以有效地将吉凶不定的原因推向问卜者自身，以化解信仰的危机。

#### 四、小 结

以上研究表明,“镇宅法”在敦煌写本宅经中相对于占主体的相宅理论而言是独立和起补充作用的。鉴于镇宅法术具有“影响事物进程”的巫术特点,因此,敦煌写本宅经对“镇宅法”的“移植”,一方面可以弥补占卜理论自身的缺陷,即通过占卜与镇厌法术的结合以满足社会信众既可预知、亦可改变的命运观;另一方面由于“镇宅法”中融入了道德因素,因此结合了“镇宅法”的宅经,可以充分利用道德的非量化特点,以摆脱占卜实践中占辞与人间事实不符的矛盾,增加自身的变通能力。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所展示的占卜、巫术互补结合并融入“德感”的占断模式,在古代社会是有代表性的,它使占卜不仅获得了彻底的“非逻辑变通”,而且其所谓“趋福避祸”的功能也得到了极致的发挥,从而巩固了自身在传统中国的存在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 [2] 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3]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6.  
[4] 陈于柱.唐宋阴阳相宅宗初探——以敦煌写本宅经为考察[J].敦煌学辑刊,2002,(2).  
[5] 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中的八宅——“八宅经一卷”研究[A].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下)[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6] 陈于柱.关于敦煌写本宅经分类问题的再讨论[J].敦煌学辑刊,2003,(2).  
[7] 赵贞.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J].文献,2004,(1).  
[8] 陈宁.中国古代命运观的现代诠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9]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J].敦煌学辑刊,2003,(1).  
[10] 旧唐书[M].  
[11] 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 晋书[M].  
[14]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02.

[责任编辑 刘雁翔]

### Illogical Transformation

#### ——An Analysis of Complementary combination of ancient divination and witchcraft in "Dun Huang Xie Ben Zhai Jing"

CHEN Yu- zhu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1, China)

Abstract: Divination and witchcraft are usually seen as two different thinking tendencies towards mysterious culture. As a book about divination for housing, "Dun Huang Xie Ben Zhai Jing", however, takes some thoughts from witchcraft, which gives the divination some il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refore allows more explanations when the divining words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ality. Focusing on the case study of "Dun Huang Xie Ben Zhai Jing", the paper indicates the exist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l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divination art.

Key Words: "Dun Huang Xie Ben Zhai Jing"; divining principles for housing; divination; witchcraft